名人 与城市

阮仪三谈中国古城保护

本报记者 侯 丽

中国的古城曾经非常有特色

上世纪50年代末,阮仪三所在的上海同济大学建筑系有许多海外归来的优秀老师。当时建筑系请来了德国专家,讲授欧洲城市建设史。专家们建议应研究中国的古城,研究古城的保护。“当时我跟着同济大学研究中国城市史的老师学习,并担任助教,学到了许多东西。”

同济大学建筑系在国内外不同时期的建筑思潮面前,始终抱着冷静观察、独立思考的态度,具有兼容并蓄、博采众长的胸襟,这使得同济建筑系拥有一种独特的学术品格。

大学毕业后,从1961年至1964年,阮仪三对中国城市进行了一次全面的调查,基本上把当时中国最有名的城市跑遍了。当时,上海徐家汇藏书楼拥有全国最多的县志,大约有43万卷,内容广博,品种繁多,涉及到内地大部分的城市形态。“那会儿,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北方的就是北方的,南方的就是南方的,高原的就是高原的,平原的就是平原的,而且都有完整的史料记载。”

当时,内地的经济状况不好,尤其是1961年、1962年间,阮仪三在全国做调查历尽艰辛。不过,这些调查却为他跟随老师合写《中国城市建设史》的初稿奠定了基础。

上世纪80年代,经济开始复苏,许多城市开始大规模地开发、建设,但是却没有明确的、科学的建设思路。当时有人提出“复兴开路”的说法,修马路、拆掉旧城建新城。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许多城市的古建筑被拆除。

阮仪三尤其提到了山西的古城古镇。我国60%至70%以上的重要的木结构古建筑在山西。山西许多古城都有非常完美的形态,里面有晋商留下的明清风格的建筑等。“上世纪60年代的大同,作为边防城市,边防设施完整,非常有特色,但到80年代时就被拆得差不多了。当时觉得非常苦恼、非常可悲。”

古城保护遭遇巨大挑战的几个阶段

阮仪三说,如果总结一下,我国的古城、古建保护遭遇挑战集中在几个阶段:一个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全国各地大兴土木,拆房子、修马路、建新城。很多老建筑、老城镇就在这样的建设中被拆掉了。而在欧洲,像古罗马、雅典等,老城区一般是不动的,会一直很好地保存下来。

另一个阶段是上世纪90年代以后,房地产的开发给许多城市的古建筑、文化遗产的保护带来了巨大影响。“1982年,我国颁布了《文物保护法》,城市建设中对文物的保护加强了,对古城、古建及有保留价值的旧城区的保护办法还是缺位。因此,从80年代到90年代,许多很有特色的民居遭到了破坏。我们总在说‘旧城改造’,但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欧洲没有这种说法,准确地应该叫‘旧城复兴’或‘旧城更新’,是城市的一种‘有机更新’。在欧洲,1840年就有了《建筑保护法》,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深思。

“多亏平遥、周庄开发得慢了一点”

今天的平遥以其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城和古建筑而闻名,而在1980年阮仪三开始关注它的时候,平遥正在进行拆迁。

阮仪三说,因为当时的平遥比较穷,没太多钱搞建设,因此,它的拆迁还算慢的,刚刚扒了几个城墙口子,一条大马路开进去180公尺,拆掉了三十几幢明代建筑,拆掉了一百几十幢清代建筑。而在山西的其他城市,有的当时已经拆了几百幢、几千幢。

其实,当年的太谷、祁县、忻县、解休,跟平遥一样,都是非常有价值的古城。上世纪60年代,阮仪三去调查过这些城市。紧邻平遥的,叫做太谷城,是孔祥熙的故乡,平遥是有著名票号的城市,太谷也是。最大的票号在平遥,第二大票号在太谷。

“当时平遥有7家大票号,太谷有17家大规模的票号。当时平遥和太谷是姐妹票号城市,而且太谷比平遥还大,有完整的城墙,完整的钟鼓楼,完整的孔庙,完整的各种各样的坛庙,很多很好的民居。”阮仪三说:“就在80年代,太谷开始拆掉旧城建新城,大马路通进去,汽车开进去,现代化了,但许多古建筑也被拆掉了。”

周庄最终保护下来也是因为较穷,较偏僻。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周庄还是个交通闭塞的小镇。从上海到周庄,来回要花4天时间。镇上不通公路,必须坐船才能到达。也正是因为如此,周庄当时还没有被毁坏,完整地保留了明清民国以来的历史风光。

阮仪三提议保护周庄时,在当地受到了冷遇。2000年,为了进一步发展旅游,苏州市要规划修建一条公路,准备从周庄西北侧穿镇而过。在分管副市长的主持下,公路很快开到了周庄门口。而阮仪三却铁了心要阻止这条公路的修建,为此不惜与一些官员发生了正面冲撞。

最终,在阮仪三的规划保护方案下,周庄重新焕发了生机,旅游也逐渐红火起来。

上海徐家汇藏书楼

平遥古城

关注上海石库门、江南古典私家园林

阮仪三最近正在关注上海石库门及江南古典私家园林的保护情况。他认为,石库门是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民居,而且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保护下来非常重要。他重点谈到了对上海新天地的看法,他觉得上海新天地更多的是一种商业开发,离原汁原味的石库门还有很大的差距。但也正因为新天地留存了上海里弄的风貌,吸引了很多人到这里欣赏上海石库门留存的历史建筑,体会这些建筑的风韵。“可以说,新天地很好地利用了历史因素。”

阮仪三对江南古典私家园林的研究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同于集合了全国许多财富、官方色彩浓重的北京皇家园林,江南古典私家园林来自于家庭,更多地附带了主人的想法、理念,家庭个人的文化气息浓厚。江南古典私家园林的产生可谓“天时、地利、人和”。自隋唐以来,江南地区一直保持着良好的经济发展态势,园林兴建不辍,这些私家园林一般富有文心和书卷气,景色“雅、朴”,因地制宜,富有个性;居住与园林的游赏功能密切结合。“中国的园林中,苏州保护得很好,江南一带保护得好的还有扬州、吴县、上海等,都留下了很多极有价值的园林。苏州园林的风格至今对我们的影响很大,比如建筑大师贝聿铭,他的许多作品就传承了苏州园林的特色。”

中国有一句流传很广的赞语,即“江南园林甲天下”。江南私家园林是中国传统园林的代表,是园林艺术的珍宝,苏州园林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阮仪三说,他的最新研究成果《江南古典私家园林》马上上市,书中对现存不多的实例进行赏析,通过文字和丰富的图片,展现给读者一处处江南的园林以及一个个园林的江南,以此呼吁人们加大对这些园林的重视和保护。

阮仪三,1934年11月21日生于苏州市。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济大学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研究中心主任,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历史文化名城学术委员会副主任。1951年至1956年服役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1956年9月考入同济大学,1961年7月毕业留校至今。

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阮仪三为平遥、周庄、丽江等众多古城古镇的保护辛勤工作,享有“古城卫士”等美誉。在首批“全国十大历史文化名镇”中,有五个镇的保护规划出自阮仪三之手。

周庄水乡

延安人的『闹』

卜 贺

我在延安考察时,注意到了一个有趣的语言现象,当地人口头上频繁出现一个动词:“闹”,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闹生产,闹秋收。我问他们,为什么总要用这个“闹”字?一个老农告诉我,说陕北人天性喜闹。

埃德加·斯诺曾经望着延安的沟梁峁壑发出这样的感慨:这是风神的杰作,是抽象派画家的胡涂乱抹。他惊叹:“人类能在这样恶劣的自然条件下生存,简直是一种奇迹。”

在作家高建群看来:自然的法则既是客观的,又是辩证的;陕北的冬天是寒冷的,温暖在窑洞,脚下的黄土地是呆板且贫瘠的,生动与丰富在人们的心里。吹唢呐,唱民歌,打起腰鼓那阵势,让天地惊,鬼神泣……决不能让灵魂沦陷在现实的苦难里。

余秋雨在谈到赵本山及其小品艺术的时候说:赵本山把东北人的苦难变成了笑声,苦中作乐是一种境界;中国人的苦难太久、太久了,人们是多么地需要笑声啊。

如果说,东北人把苦难变成了笑,那么延安人则把苦难变成了“闹”。

千百年来,穷山恶水给陕北人带来诸多苦难。但在陕北人的精神世界里,他们并不甘于听天由命。为了打破环境所给予他们的这种严酷与沉闷,他们在生活中时不时地要闹腾一下。

一个“闹”字,使延安人超越了现实的苦难。事实上,他们超越苦难的方式不是回避,而是一种坦然面对。这并非是一个孤证。比如:他们将“出生”叫做“落草”,把“死亡”叫做“上山”,这是一种幽默?抑或是一种调侃?至于“生存”,他们干脆就将其叫做“受苦”,还有更加形象生动的说法:“熬!”

在漫长的岁月里,怎么来对付这个“熬”字呢?延安人出了这个“闹”字。大千世界中,金克木,水克火,而延安人如今用“闹”来克“熬”,应该也是大自然演进的一种平衡法则。

一个“闹”字,道破天机。如何打发那些单调乏味的岁月,时不时地闹一下?闹什么呢?闹秧歌、闹社火、闹花灯。这一闹,打破了沉寂,释放了郁气,闹是必须的,因为那“闹”字包含着人类的天性,或者说是野性——桀骜不驯,狂放不羁。事实上,延安人表面的“闹”是以其骨子里的“强”作为底蕴的,这中间透视出延安人骠悍的民风。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关于延安人的性格特征,在当地的一些志书上多有描述。“俗骄悍、喜功利;习骑射、尚忠勇”(清《延安府志》);“尚气节、先勇力”(明《延安府志》);“怀忠畏法、果敢勇往”;“习弓矢、好战斗”;“好交崇俭,民风淳朴,虽贫苦不为盗贼。惟妇不知识,自昔已然”(清《榆林府志》);“水甘土厚,风气冲和;民尚勤朴,多喜射猎,不事纺织;文武士大夫颇尚气节”;“土风淳朴,民情愚憨,务本不知逐末”(清《延安府志》)……“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翟(狄),修心战备,高上气力,以射猎为先……以材力为官,名将多出焉。”(《汉书,地理志》);“延风淳朴而不审是非,不察利害,一时迁就,终获噬脐”;“性胆不退却,有古小戎之风”(《延绥府志》)。

陕北民歌中也有这样的歌词:“羊肚子手巾哟三道道红,刚强呀不过个陕北人;脚踏着地来哟头顶着天,世上的那好汉咱一人担;正晌午的日头哟后晌午的风,那炸油糕的火呀咱们的心!”

这种由刚强作为底蕴的“闹”一旦侵入到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便会演绎出另一种博大宏阔的历史图景。

千百年来,无数英雄豪杰在这里叱咤风云,建立丰功伟业。比如:轩辕黄帝在这里开创了华夏文明,大禹在这里治理天下洪荒,与黄河壶口瀑布相映成辉;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在这里长期镇守,他的英名与这里的吴起镇一同传至今日;秦始皇曾两次涉足这里,把宽30多米、长700余公里的秦直道从关中直修到了包头以北的九原;西汉时期的飞将军李广长期在这一带驻守,龙城飞将御汉关,胡马岂敢度阴山;东晋的安北将军屈子(又名刘勃勃,即赫连勃勃)在这里建立了大夏王国,统万城遗址留存至今;北魏出生在延安城南花源头村的巾帼英模花木兰,替父从军,传为千古佳话;北宋时出生于神木县杨城的名将杨继业,英名流传至今(杨于公元986年在晋北作战时重伤被俘,后绝食而死);党项族首领李继迁、李元昊在这里建立了西夏王国,与宋王朝分庭抗礼100余年,其疆域从黄河晋陕峡谷直到西月氏、土蕃一带;米脂县李继迁寨的农民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党项后裔),从这里出发,三返河南打进了北京城……

站在封建道统的角度上看,“闹”是对礼数的一种反叛,是对规矩的一种挑战——特别是“安塞腰鼓”那种撂蹶扭胯的动作,过去常为中规中矩的关中人所不屑。

延安人的所有“闹腾”,在1935年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前,都只具有形式上的价值,并无助于社会的改良乃至革命。因而,无论是闹社火、闹秧歌,还是闹花灯,闹来闹去,闹了个“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无论是腰鼓的老把式还是秧歌的伞头们都知道,只有共产党来了之后,陕北人才知道了“闹革命”,陕北人俗称:“闹红”。

延安人通过自己的革命实践终于认识到,唯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使他们这些受苦人过上好光景。谁能料到,尔后延安人的话语竟产生了如此大的影响。据笔者考证,“闹革命”是延安人的原创发明。很显然,后来,人们吸收了延安人这种形象生动的语言方式。“闹”是非常形象且富有诗意的一个字(古人诗云:红杏枝头春意闹),它里面包含有原始的生命冲动,有一种由于对现状的不满而引发的宣泄,这种宣泄酣畅淋漓无所顾及,有一种豁出来的感觉。

从文字语言的情感诉求上来讲,“闹”字不仅具有力度,而且具有鼓舞性与战斗性。

走进 博物馆

开封地下古城有望重见天日

——由“城摞城”博物馆看千古之谜

修 文

开封城,“城摞城”

开封人祖祖辈辈流传着这样的话:“开封城,城摞城,地下埋有几座城”和“开封城摞城,龙亭宫摞宫,潘杨湖底深藏几座宫”。

这些流传在很多历史文献中都有记载,可很长时间没有什么物证来证实。

1981年5月中旬,开封市园林部门在潘家湖清淤施工中,发现推土机推出很多古建筑用的方八砖和朱砂红的帘子篾,人们马上将情况汇报给开封市博物馆负责人。

2000年5月,为了印证开封城摞城的传说,开封市城墙文物保管所选择西门城楼一段城墙的地下部分进行发掘,结果发掘出一段保存完好、清晰可见的清中期古马道遗迹。更令人惊奇的是,在第二层古马道下约50厘米深处,年代更为久远的古马道也惊现出来。三层古马道真切展示了开封城摞城的奇特景观。

为了让城墙摞城墙、马道摞马道的千古奇观展现在人们面前,同时又不破坏大梁门和古城墙的整体面貌,开封市2004年8月在大梁门北侧150平方米的城摞城遗址上,用20毫米厚的防弹玻璃搭建了一个透明的开封城摞城展览馆。

开封考古人员经过20多年的发掘勘探发现:开封市地下3米至12米深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3座国都、两座省城、一座中原重镇。这6座城池自下而上分别是:战国时期魏国的大梁城,唐代的汴州城,五代及北宋时期的东京城,金代的汴京城,明代的开封城,清代的开封城。这些地下古城能不能开发出来,一直是人们关注的焦点。

据开封市文物管理局副局长、开封市文物工作队队长刘春迎介绍,大梁城位于约距现在地表12米至14米深处,汴州城约距地表10米至2米深,东京城约距地表8米至10米深,金汴京城约距地表6米深,明开封城约距地表5米至6米深,清开封城约距地表3米深。

考古人员在潘家湖下还发现了一些文物。刘春迎说:“这些古城都是被黄河水淹没了,而每次洪水过后,幸存下来的和外地来的人们知道下面有宝贝,他们纷纷挖宝,所以留存下来的文物并不多,但他们不可能挖得很干净。我们考古发现的只是一些墙体和根基,不像人们想象的、仍然屹立着的宫殿。”

开发难在哪?

在地下城的开发过程中,州桥是备受关注的。

有1200多年历史的州桥是北宋时期东京城内横跨汴河、贯通皇城的一座石桥,遗址在今开封市中山路中段,大纸坊街东口至小纸坊街东口之间,明朝末年因水患,桥被淤埋在现地平面以下4米处。据《东京梦华录》记载:“州桥,正名天汉桥,正对于大内御街。其桥与相国寺桥皆低平,不通舟船,唯西河平船可过。其柱皆青石为之,石梁石榫楯栏,近桥两岸皆石壁,雕镌海牙、水兽、飞云之状。桥下密排石柱,盖车驾御路也。”它是“汴京八景”之一。

1984年8月17日至9月13日,开封考古工作者在中山路地下4.5米处发现并挖掘出了州桥,根据对州桥桥面的清理和对桥的实测,该桥南北长17米、东西宽30米、孔高6.58米、拱跨5.8米,据说桥券内跑公交车绰绰有余。桥面用的是青石板,但石板已残缺不全,裸露在外的大部分是青砖。桥洞内出土文物数件,有瓷碗、瓷炉、瓷盆、瓷罐等,分属金、元、明等朝代。可惜因为桥的两端上面都是大型建筑物,无法进一步发掘。考古工作者只能回填。淤埋于地下340多年后,州桥只能和少数人短暂见面,就又带着无奈重回地下。

从1984年开始,开封市围绕开发州桥已经进行了三次大讨论,要求开发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早在1986年,开封市旅游、城建等部门就提出过一个综合性开发方案,但因缺乏资金未能实施。

由于开封市地势低于黄河河床,地下水位十分高。一位家住开封的朋友说,他家院子里的压井只打了3米就出水了。要开发地下城,水位高成了“拦路虎”。

长期研究、关注开封地下城的河南大学宋代历史研究所所长程民生教授说:“开封地下城丰富,层次多,年代久,保存完好,在全国少见。很多单位都曾经想开发,但没法开发。因为现在的开封市的中轴线和地下城的中轴线一致,如果开发需要城市进行大规模的搬迁。但部分开发是完全可以的。战国时的大梁城保存最完整,在地下20米左右,受水位限制,开发是不可能的。”据他讲,曾经有一家房地产公司想大面积开发地下城,因为需要资金量太大而望而却步了。

地下古城有望重见天日

如今,开封终于对地下城开始了开发。日前,地面上的搬迁工作已经展开。根据开封市国土资源局对《大宋文化博物馆·开封城摞城新郑门遗址建设项目规划拆迁范围实施房屋拆迁》的批复,此次拆迁房屋总建筑面积49286.67平方米,具体范围是:夷山大街以西、汉兴路以北,宋城广场以南、金明小学以东。

根据规划,城摞城博物馆将用地6.26万平方米,由开封历史动漫演示厅、遗迹馆和文物陈列馆三部分构成。开封历史动漫演示厅拟用现代动漫技术把开封形成城摞城现象的历史沿革情况展示出来;遗迹馆位于新郑门古城墙遗址上方,占地2.42万平方米;陈列馆位于遗迹馆南侧,将集中陈列展示新郑门遗址发掘出土的遗物以及与古城开封发展史有关的遗物,建筑占地3600平方米。

虽然开封地下6座城不能全部一次性开发,但很多开封人都希望州桥和其他目前容易开发的地方尽快发掘出来,让两千多年前的文明能早日露出峥嵘。

州桥挖掘现场